

現代価値与東方理想

薛毅氏

〈中国上海師範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感谢大家,感谢加加美教授。由于我不懂日语,所以我阅读的竹内好非常有限。但由于我长期研究鲁迅,竹内好对于我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我也热衷于向中国的学生、同事介绍竹内好。我这次向大会提交的论文其实是我在中国的一次演讲的报告。但我现在面对的是日本的学者和听众,所以我现在的报告可能并不合适,所以再次表示歉意。竹内好对我而言的重要性在于,他以中国革命和亚洲经验为基础,从理论上探索了新的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可能性,下面我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所描述的中国是否是理想化的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在读竹内好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两个问题。

在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的会议通常会被理解为法西斯主义摇旗呐喊的会议,在二战结束以后日本的许多年轻人在重新谈到这个会议的时候,都以受害者的身分表示对这个会议的不满。他们诉说自己在二战期间之所以会全心全意地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支持他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因为受到了近代超克的观念的蛊惑,这样的观念在号召日本的年轻人起来创造新的历史,超越欧洲近代史的历史。也正好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竹内好写了一篇文章叫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他直接赞美了所谓大东亚战争,竹内好怎么会这样丧失理智的呢?竹内好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什么积极意义呢?他强调的正是这场战争向西方挑战的这一面。

与此同时他赋予战争以解放东亚各国人民、驱赶西方列强的性质。因此他区分了太平洋战争与侵华战争,他说对于在这之前的侵华战争,他们那一代是困惑和歉疚的,而现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伟大的,因此在此之前的侵华战争也变得是可以忍受的。因为现在日本是在为亚洲而战。

从表面上看竹内好的说法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说法是相重合的。战后日本思想界从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的角度来反思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思和批判日本的民族主义和近代超克的思想。也就是说把日本的民族主义和近代超克的思想与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以必然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这形成了日本战后思想界的总体氛围。但就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中竹内好显示了他作为思想家的独特存在,他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方式。既然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那么否定民族主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亲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反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想家都坚决抨击和反对民族主义。

但是竹内好发现这样来夹攻民族主义正好使民族主义变成以极右翼的形式返回日本。极右思想从肯定民族主义出发进而肯定法西斯主义,肯定大东亚战争。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人们这样处理民族主义,反而使民族主义以更坏的形式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否定民族主义会使得日本国民的民族认同心理无从安放,战后日本国是被美国所占领的,日美安保条约这样的东西不仅使美国在日本俨然是老

大，还使日本成为美国向亚洲侵略和渗透的跳板。在这种格局下日本的民族心理遭遇到了空前的困难，这种心理在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里没法得到表达，那么极右势力正好趁虚而入，把民族心理表达为最坏的形式。也就是说当自由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要否定法西斯主义，要追逐到民族主义的时候，民族认同的正当性也受到了威胁，这种正当的民族心理就会在右翼的推动下得以变形，肯定民族主义出发就要肯定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情况有点类似被压抑者的回归，你为了一个好的目标不停地去驱赶你认为是坏的东西，结果你的行为成为成全了这个坏的东西，你越驱赶它它反馈的程度也越大。

面对这样很被动的局面，竹内好是怎样展开工作的呢？竹内好愿意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必然联系解除开来，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必然演变成法西斯主义，他更强调的是如何在日本的民族主义当中抢救出一些东西，同时和战后日本的民主化的改变的进程结合起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日本的军国主义。但这种方式也总使得竹内好有点不太正确，为什么呢，怎么说呢，竹内好是否赞同民主呢，是但是好像又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赞同民主但和自由主义的民主又不是一回事，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也是赞成民主的，我们把民主设想为一种制度，一种由法律条文而保障的制度，好像只要有了这条文，这种制度，我们就相信民主就成功了，但竹内好不这样看。

竹内好观察的是这个条文这种制度和日本国民之间的关系，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直接参与下制定了宪法，这个宪法在保留天皇制的基础下引进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竹内好是怎样评价新宪法的呢？他说新宪法强调人类普遍的原理，非常漂亮，但作为日本的宪法让竹内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说这个宪法对我们而言没有什么亲近感，很疏远。竹内好敏感到的是有着这样普遍主义式的民主与日本的本土经验是相脱离的，西方诞生的普遍原理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具体实践而产生的，是对这种实践的抽象，而与此相应的是东方也需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从东方的具体实践中概括和抽象出由东方经验支撑着的

普遍原理。因此竹内好更注意旧宪法，这又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他说旧宪法不是说想扔掉就扔掉的，就好比说新宪法不是说想发挥作用就能发挥作用的，新宪法虽然好但并没有成为自己的东西，旧宪法虽然很负面但还是深深根植于国民之中。所以问题就是如何把旧宪法当中一些坚实的储藏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变换出来，也就是要对经验和传统进行再解释，这样才能使人类普遍原理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不再是自己需要被动接受的东西。换句话说来说普遍原理不是用来向民众说教的，而是诞生于与民众休戚与共的具体实践中，它应当充分汲取民众的喜怒哀乐，这样的实践和仔细研究和转化日本民族经验中已有的实践形式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尽管这些形式和负面的和错误的，但仍是需要认真对待和需要抢救的。

竹内好对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国革命有着非常高的评价，中国读者如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社会主义运动首先持否定态度的话，那么当他再来阅读竹内好的时候，肯定会认为竹内好在胡说八道。就是现在对竹内好非常有兴趣的一大批中国读者也会认为竹内好是在想象中国历史，特别是想象中国的革命历史。他树立了一个理想的中国的形象，目的是为了批评日本。不过这也许会阻碍我们对竹内好的进一步分析，加入我们设定竹内好描述的中国是一个理想的中国的形象，那我们心中大概有一个真实中国的形象，问题是这个真实的中国形象是站在什么角度，用什么知识背景下描绘出来的呢，我觉得应该破除理想和真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全盘接受竹内好笔下的中国形象。中国知识分子自1980年代以来，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历史、革命历史的一套说法，这套说法里有一个真实中国的形象。这个说法是建立在对方现代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的，那里表达了普遍人性和人权，应该是普遍有效的，而中国的具体实践需要经受源自西方的普遍原理的检验。

所谓中国真实的形象产生于具体实践和普遍原理的距离之中。正是这个距离，对这个距离的不同态度让我们站在竹内好的对立面。也就是说竹内好

在距离中质疑了西方的普遍原理，而强调了在中国具体实践中产生的新的形式，而对我们来说是从距离中认同了西方普遍原理，把中国的具体实践看成是落后于普遍原理的，分歧在这里产生了。竹内好举了鲁迅的一篇文章作为例子，〈聪明人、傻子和奴才〉，是《野草》里面的，一个奴才受穷遭遇悲惨所以他找人诉苦，一个聪明人跟他说了一通，聪明人只是非常怜悯地对他说，唉，没办法只能这样子了。过了几天奴才又感到不舒服了，就去找了个傻子对他诉苦，告诉傻子他每天干的活儿有多脏多累，而住的地方又是多么阴暗没有窗户，傻子大怒，让奴才带着他去奴才的住处，二话没说就开始砸墙，奴才问他干嘛砸墙，傻子说是要为他开一扇窗户。奴才听了急了，大声哭喊着说有强盗在砸屋子，主人就带人将傻子打跑了，还特别表扬了奴才，奴才很高兴，过了几天他遇到聪明人还得意地说起这件事。竹内好用寓言的方式解读这个故事，竹内好提出了一个问题，鲁迅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的。我们大概一眼就可以看出鲁迅是站在傻子的立场说话的，傻子懂得去反抗敌人，与敌人作斗争，而奴才不但不斗争，反而会成为主人的帮凶。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鲁迅讽刺的聪明人，好像是知识分子，他好像很悲鸣，对奴才的遭遇充满同情，但他能够指出的出路只是让奴才去忍受。鲁迅本人也是这样批判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表面上挺有同情心，但是它却不允许改变实际存在的奴役结构。

但是竹内好的解读非常特别，他不认为鲁迅认同的是傻子的立场，竹内好拿这篇文章与日本文学作了对比，他说反抗斗争的傻子文学在日本很多，鲁迅不属于这种文学。因为傻子文学不考虑一个鲁迅紧紧纠缠着的问题，那就是傻子的反抗是否真的为奴才开辟了一条出路，可以说鲁迅是肯定并赞成傻子的行为的，但傻子没考虑到这种反抗奴才不接受也没让奴才真的有一条出路。鲁迅发现傻子并不能拯救奴才，竹内好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解释，鲁迅是站在奴才的立场看问题的。这是竹内好的读法，估计鲁迅是不会接受的吧。奴隶是处于主奴结构中但并不赞同为奴的位置，而奴才却是处在这个位置

中，却认同它，喜欢这个位置的。但竹内好并没有说文章中的那个奴才就是鲁迅，他的意思是说鲁迅也让自己处在这个位置上，但他是一个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奴才。他（鲁迅）自己承受的是大痛苦，大悲哀，鲁迅曾经感叹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梦醒了之后无路可走，所以做梦的人还是不要惊醒他为好，因为鲁迅太懂得醒来而无路可走的痛苦了。鲁迅的特点不是他一次又一次的幻想做梦，而是一次又一次醒来，一次又一次发现找不到出路，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困境，陷入绝境，这就是他完全不同于傻子的地方。

在现代世界格局中，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奴才，他也做梦，但迟早会醒来，醒来发现他无路可走，鲁迅就是中国的表达者。为什么中国没有出路呢？在西方和中国之间形成的主奴结构中为什么就没有出路了呢？竹内好非常惊人地概括了这个奴才的特点，奴才拒绝做奴才，同时拒绝成为主人。拒绝做奴才使奴才不认同做奴才的位置，拒绝成为主子是奴才无法仿效主子。而无论继续当奴才还是成为主子，都是主奴结构的延续。我们在1980年代把鲁迅最大的精神归纳为绝望的抗战，这是很正确的，鲁迅自己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容易就此点作形而上学的玄想，把鲁迅视作加缪、沙特的同类。但在竹内好的眼中，这种反抗和绝望却是和中国的第三世界的位置结合在一起的。不想成为奴才是对自己的否定，换句话说，是不想充当在西方控制和奴役下的依附于西方的国度，又不想成为主子是对奴才幻想的否定，换句话说是不想成为西方或取代西方。这是双重抵抗，鲁迅把抵抗看成是在主奴结构中中国的态度。竹内好认为在现代世界的主奴结构中，不同于日本的转向，中国的方式是抵抗，中国拒绝在这个结构中当奴才，也拒绝变为主子。

竹内好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如我们设定西方是进步的，而东方是反动的，日本从反动变为进步的速度非常快，中国则极为缓慢。他说中国的反动力量非常强大，面对西方的挑战并不愿意顺从西方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也曾谈论过鸦片贸易中中华帝国如何不顾时势，安于现状，并断定这样一个

帝国要在这样一场生死的决斗中死去，谁都知道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失败的历史，在失败的过程中凝聚了深重的失败感。由于反动力量强大，改变中国几乎无从下手，按鲁迅的话说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会流血。在鲁迅看来中国简直是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最早醒来的人只能是孤独者和绝望者，这一认识我们大概也都是具备的，和竹内好大概也差不多吧。

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中国的反动派要为近代中国的历史负责，我们所关心的还是中国如何快速地进步。但竹内好不这样看问题，他关心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什么新东西，他发现在反动势力如此强大的中国，它丧失了像日本似的由上而下的改良的机会，由此引发的是中国内部不断加重的危机进而引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再有值得玩味的地方是：如果我们按照西方进步的标准，我们可以说日本是进步的，而中国的反动的，日本迅速西化，有效地兴起了改良主义运动，而中国不断推迟西化的进程。但竹内好发现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日本由于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保留了等级制度，而中国自下而上的革命则不断冲毁等级制度，也就是说中国有社会革命，而日本迅速的西化使日本丧失了社会革命的条件和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先进和反动又倒转过来了。

这个社会革命的终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竹内好观察现代中国的敏感点在于，中国在革命实践中的新的表述。他引用了孙中山的一段话，中国对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家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家国家，也去学列强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重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轻，这才是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弱小民族要扶植它，对世界列强要抵抗它，如果全国人民都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若不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没有希望。竹内好为这段话感叹不已，中国当时还没有形式上的独立，却

把握着这样高远的理想，竹内好说这正是正视自己国家被殖民现实从苦难中结合本民族传统打造出来的理想。这里面蕴含着新的人类普遍价值的曙光，竹内好强调这种理想不是外在的，被赐予的，而是自身的内在的生长出来的。所以竹内好把握的与其说是理想中国，不如说是中国的理想。而且他从中国的理想实践中看到了西方所不能包容的人类普遍价值，竹内好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孜孜以求对西方现代价值的超越与替换，他说所谓否定殖民统治也就是抛弃自我保存的欲望，不是通过掠夺其他个体而支撑的，个体必须在自身内部产生通过自我否定而包容其他个体的立场，世界不是通过掠夺而是通过给与建构的。因此竹内好关注的中国理想实际上是一种在东方土壤中形成的新的价值观。

最后我向在座的学者和听众提出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我在阅读竹内好的时候曾经多次向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提问，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后竹内好对此有什么评价，我得到的回答是他保持沉默，我不知道这个沉默里面有什么含义，我遇到过好几个日本学者，年轻时代受竹内好的影响而从事中国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全面地打碎了他们关于中国的想象，所以当我现在想他们提起竹内好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奇怪的表情，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过时的人物，我发现也正好是文化大革命让他们彻底远离了竹内好。而我认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在中国是诞生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形成于80年代，依存于中国80年代的现代化的知识氛围，我认为这套知识其实对于文革没有任何解释能力，不能解释文革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中国有一万人会卷入到这场运动当中去，也不能解释文化大革命对于中国人整个心理结构的影响，所以我认为需要重新理解文革，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竹内好。同样理解竹内好，来摆脱由80年代形成的知识，也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文革。我的讲话完毕，谢谢大家。